到大学去：传承人“组团创新”，非遗“跨界生长”

文化中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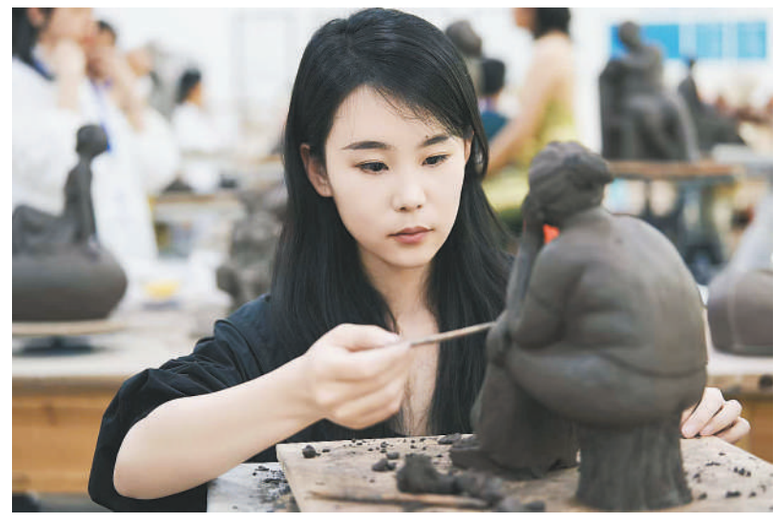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树人，也是如此。

当南腔北调的方言在同一个教室里响起，当刻刀、染料、丝线被用来一起完成一件作品，这些从四面八方聚到大学校园的传承人，让非遗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开始实施，高校加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10年来，传承人们一批批走入高校，像树木呼吸生长，带动着乡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文化养料的吸收、循环。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的多所研培高校，探寻这一个个“树人”的故事。

富春茶社点心类创新品种寿桃酥，蕴含健康长寿的寓意。 扬州大学供图



2024年4月，第十七期陶瓷雕塑研修班，学员正在创作。 景德镇陶瓷大学供图

让“老根脉”扎得更牢

“查缺补漏”“巩固技艺”“理论熏陶”“建立体系”，这是多所高校的研培教师们反复提到的几个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高峰介绍，该校从2020年以来共承办了4期非遗戏曲传承人研修班，培训戏种包括昆曲、京剧、淮剧、徐州梆子戏等。为解决年轻传承群体断层、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脱节等问题，学校优先选拔20-35岁青年、基层一线从业者。

在谈及研培班和青年演员们之前接受的培训有什么不一样时，高峰说：“我们更加成体系。有一些他们过去在戏校没有接触过的、师傅也讲不清楚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和专家就可以为他们补充、拓展。比如，某个唱腔是怎么来的，某个剧种是怎么产生的，某个戏的创作背景是什么等。”

高峰举例，几年前，南京市越剧团要排一部《李清照》，李清照是文学家，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她的作品，就不能展现好李清照的个性和气质，“这些相对抽象、高深的内核，恰好是高校的文学理论专家所擅长的”。

富春茶点制作技艺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美食非遗和一般烹饪精品、特色小吃的界限在哪里？如何避免其“泯然众人”？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院长侯兵说：“学员们手艺很强，但是在文化层面，特别是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解认知、非遗如何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国际传播上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还能为其补充许多。”

针对传承人的诉求和困惑，高校研培班的老师们也广泛采集并尝试解答。比如，现代人注重膳食营养，过去的一些配方猪油用得较多，需要怎样调整改良？如何运用科技帮助菜肴营养精准配比，同时让非遗产品更具稳定性、标准化，又不丢失非遗精髓？

一些高校承担“锦上添花”的工作，还有一些高校则在“雪中送炭”。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苏工美”）是“桃花坞木版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创作过程，需经过画稿、刻版和套印3道主要工序。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苏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参与苏工美研培班教学的孙一波说，2001年，桃花坞木版年画社仅剩3位年近六旬的艺人，“没有人学，别说外地人了，苏州本地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这时，苏州市政府将桃花坞木版年画社划入苏工美，苏工美将木版年画课程纳入教学，规定选学此课程获得的学分可以和原专业的学分通用，这项技艺开始从高校复苏。2017年，学院正式在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中开设桃花坞木版年画方向；2019年起，苏工美开设桃花坞木版年画研培班。

“和校内课程相比，研培内容较为浓缩简短，原本还担心学员接受困难，但实际上学员们非常珍惜研培机会，求知若渴，我们也针对他们的需求设置进阶的课程。”孙一波说。如今，他还与网络游戏公司合作，用桃花坞木版年画呈现二次元的国风形象。

让“新枝叶”伸得更远

根脉健壮汲取土壤营养，树冠也要蓬勃展开迎接阳光雨露。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参与研培计划的高等院校众多。其中许多高校研培班支持传承人将非遗产品与现代审美融合，乃至形成品牌。

浙江理工大学研培班学员赖蕾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侗族服饰的榕江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贵州榕江侗布艺术研究院院长。在事业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她还是带着问题来到了研培班。

“问题就是怎样让别人买单。”赖蕾说，“购买和使用，是非遗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一环。我还带领许多织娘，我想增加她们的收入，让她们更有自尊自信。”在研培班中，赖蕾的问题得到了一个个解答。

“村超”是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的一张闪亮名片，曾有上万人到现场观看，赖蕾接手过一项工作，就是为“村超”制作吉祥物布偶。“我在研培班中获得了一些启发。”赖蕾说，她学到了许多国礼和世界级运动赛事的吉祥物的设计理念、观察分析其外形特征。最终设计出来的吉祥物“村超牛”，身体运用蓝染技术染成深蓝色，裤子上的白色花纹使用了蜡染技艺，衣服是榕江少数民族用传统手织布制成，额头上的“寿旋”也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代表性纹样。

东华大学是研培计划的首批执行高校，10年来的十余期研培班，培训了来自贵州、云南、上海、海南等多地的非遗传承人和管理人员300多人次。该校的重要理念是“正确地理解，优美地呈现”。“根据正确的理解提取民族元素，应用在时尚设计中，使其生活化。”东华大学非遗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顺爱说。

90后靳秀丽是东华大学第一期研培班的学员，也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蜡染技艺的凯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靳秀丽回忆，当时的产品大都偏中低端，材料、设计都有不足；经过研培班的学习，她了解到自己手中的技艺可以如何与现代材料结合升级，如何做单品设计和品牌建设。

靳秀丽的团队也回到苗族地区，收集传统纹样，记录文化根源，进行数字化保护，准备出版相关书籍。“我们把一些传统纹样和时尚消费的穿戴产品融合。比如，有一款与某知名品牌合作的运动鞋，鞋帮的装饰和鞋头的元素，都是对苗族纹样进行二次设计后得来的，销量很好。”

00后小伙儿施达来自云南，自幼跟随家人学习白族服饰刺绣技艺，2024年9月，他参加了东华大学第十一期“传统织染绣创意设计”研培班，探索了剪纸技艺和服装设计的结合。

“体会到了传统与创新碰撞的魅力，实现了技艺跨界融合的实践，让剪纸脱离静态展示，通过服装等载体融入日常生活。”施达说，培训也让他深刻体会到非遗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以当代语言重新诠释文化基因，同时也让传统手艺真正为现代设计赋能。

跨界创新，繁荣共生

施达体会到的“跨界”妙处，也是许多高校探索的方向，中国美术学院即是如此。最初，研培班分班的依据是技艺门类；渐渐地老师们发现，不同非遗传承人学员的工艺技巧、审美标准各不相同，但都有提升创作能力的需求。老师们想到了“跨界”。

何谓“跨界”？从表面上看，是材料的相互交叠、技艺的相互交织；从深层次看，还必须有思维层面的跨界。于是从事不同技艺的学员被聚集、混合在一起参加研培，他们组成团队，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商议、提出创作方案，一起完成作品。

湖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溪漆器赶漆技艺的十堰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晓莲高兴地发现，很多产品都可以和漆器结合，“陶瓷、紫砂、银器，都可以使用，我们想要依此开发一套新的茶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的郑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向群，利用汝瓷碎片，和木工、漆工的同学合作，设计首饰项圈，“跨界和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让我们找到这门技艺的更多可能性。陶瓷和其他工种的结合，都是对传统手艺的一种突破”。

上海大学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非遗跨界创新”的教学和研发模式，研培计划打造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不同民族的传承人共通的平台，广西、四川、湖南、新疆、江苏等地的传承人齐聚一堂，还有国外艺术家来校与传承人交流。

左手牵设计师和品牌，右手牵传承人，上海大学作为首批参与研培计划的高校，迄今承办了39期非遗研培班，对25个省（区、市）的1000余名传承人进行培训；研培学员与学院师生、设计师、设计机构、品牌企业合作，共同孵化创作非遗创新作品1200余件，涉及生活家居、时尚服饰、科技家电等领域。

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非遗展厅中，一件名为《竹画青蓝》的作品，也是跨界融合的产物——竹编的框架，却有青花瓷板作为篮底。作者林栋是同济非遗研培项目第三期学员，近年来他不断尝试将竹编与陶瓷、大漆、金属等多种材料结合。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则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江苏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传承人陈丽英的《锦瑟年华》。这是一套融入旗袍元素的紫砂茶具作品，曾在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上亮相，一式两份的另一套正在北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十年成果展。

同济大学研培项目负责人、设计创意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善威从2016年开始一直从事研培工作，“前期的项目主要是以单项非遗为主，如木雕、青瓷、漆艺；中期慢慢过渡到项目的跨界融合，如‘笔墨纸砚’‘金木竹瓷漆’；近几期，我们以设计创新为核心，让同学们的传统技艺有更好的转化可能性”。

“我们研培的目标是让非遗融入当代生活。”宋善威说，同济大学也在为非遗产品品牌化而努力，迄今已孵化有10余个子品牌。

文化批评

momo们的表演式匿名，乐后亦忧

□ 杨鑫宇

最近，我带着一群大学生做调研，其中一个小组的选题关注的是当代青年的“匿名化社交”。对这个话题，大众并不陌生，我们在网上见惯了太多形形色色的匿名网友，“momo大军”的出现，也算不上新知趣闻。在惯常的认知中，网民匿名发言，更多是出于一种不愿被陌生人“定位”或是被熟人“发现”的考虑。在社区中匿名讨论，或是使用momo这种“千人一面”的网名，使他们能够放心地直抒胸臆。

就是在这样一场我以为结果早已清晰的调研中，学生们的一项发现，让我感到颇为意外。通过发放网络问卷，以及对多名年轻人的线下深度访谈，他们揭示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匿名社交，动机并不单纯是隐藏个人信息，而是以“找乐子”为目标，把匿名机制视为趁手的舞台道具，在网上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交表演”。

这些账号要么是“经典”的momo，要么干脆就是一串平台分配的代码，其内容却丰富至极。账号背后的年轻人会故意扮演纯属虚构的角色，讲述自己想象、编造出来的故事，发表自己未必认同、却“符合人设”的观点，由此在网上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

其中，有人专门扮演情感关系中的无辜受害方，编造出各种极尽离谱之能事的“渣男渣女”式故事，把围观网友气得怒发冲冠；也有人主打反差，或是作为男生混入追星梦女的行列，体验“卧底粉丝群”的刺激；还有人冒充超级富二代，验证自己胡扯的本事能“忽悠”到多少人。对此，一句调侃性质的流行语精准地总结了这种现象——“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看着这些年轻人在网上玩得乐此不疲，作为旁观者的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很有创意，也颇为有趣。然而，代入到正常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通网民身份之中，我却多少有些笑不出来。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网民而言，我们可能刚刚才认识到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动机，但是，对于他们行为的结果，我们却可能早已上过当、吃过亏。普通用户时常看到各种自称“真实经历”，却专门瞄准舆论痛点、怒点、笑点的离谱内容，让人难辨真伪。对这类内容，许多网友初见时很喜欢看，但时间长了，便越来越觉得浪费感情。

这样的“momo大军”，也导致人们对网上的匿名发言越来越不信任，以至于很多网民看到讲述特殊个人经历的帖子时，第一反应就是“又有人在起号”，使原本相对和谐的讨论氛围荡然无存。从本质上看，当乐子成为主导，信任自然会慢慢退场，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都知道有人在演，那就不必再信。

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匿名发帖的人都在“起号”，有的人确实经历了不被理解的感情，有的人确实陷在不敢说出口的困境里。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虚构的内容一旦超出娱乐范畴，成为污染公共舆论的虚假信息，很可能对社会风气造成损害。面对这一局面，不论是年轻网民自身还是外部社会，或许都需要为“表演式匿名”泼一泼冷水，建立相对安全的边界。

年轻人追求更加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社交体验，本身无可厚非。谁不希望在快节奏的现实之外，多拥有几个释放自我的出口？但问题在于，匿名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编造、扮演、试探底线。在虚构的身份中短暂游玩，可以视为一种情绪调节；若入戏太深、做得太过，这份“乐子”终究会变味。

同样需要被提醒的，还有那些搭建舞台的社交平台。面对越来越多真假难辨的匿名内容，平台的态度不能只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许平台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对所有帖子一一查证真伪，但起码可以对高频“起号”、编造式引战、过度情绪操控等内容，设立更审慎的分发机制，给那些仍试图真诚发声的人留一条清净的通道。毕竟，在一个信任频频透支的网络世界里，让人相信，远比吸引眼球更难。

人物

陆川：让一部戏成为一批人的“嘴替”

陆川。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导演陆川近两年“跨界”拍电视剧、做舞台剧，都讲述了“失意但倔强之人”的故事。

电视剧《借命而生》中，境遇落魄、心怀正义的警察杜湘东为寻找真相，历经20年最终抓获幕后真凶；舞剧《天工开物》展现了“大明理工男”宋应星科考6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陆川坦言自己这几年时常感到“失意成了主要的情绪色彩”，但是，“探讨在失意的人生中如何获取自己的价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曾执导过《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经典电影的陆川，这20年来坚持一个创作理念：对人生的拥抱。

偶然遇见的故事，总能激发陆川的热情。当初一口气读完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借命而生》，陆川感觉真正被“点燃”了。

“我每天看各种各样的小说，但是在这本小说中我会看到自己，看到时代，看到更多人。我觉得可以通过一部戏成为一批人的‘嘴替’，替他们表达出对生命、生活的感受。”

“记录人性的记忆、这个时代我们内心的挣扎，真实的情感等。”陆川在创作中始终致力于保留原著的情感内核与时代质感，以电影化叙事手法实现艺术突破。

舞剧《天工开物》，源头是接到邀约创作“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结果，他却放弃了自带流量的人物选题“陶渊明”，选了一个在大众认知里排不上“江西历史文化名人榜”前十的人当故事主角，“很多人都很不理解”。

陆川说，在江西采风时，博物馆讲解员提到宋应星：一位6次科举未中的老先生，潜心著书，写下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明朝灭亡，但这本书留了下来，完整保存了当时的科学知识。这个故事一下子戳中陆川。“宋应星是时代的逆行者，具有现代性。别人追求功名，他在拯救民族科技遗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

陆川当场觉得这事儿“特别着急，必须马上做”。舞剧《天工开物》因此诞生。

《天工开物》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了宋应星科考6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这些篇章，正是对“敢为不同”的科学追求与“民生为本”民族自信的当代诠释。地方志对宋应星的生平描写非常“粗糙”，抓不到关于这个人的多少人生痕迹。陆川在他书中的字里行间，“能读到一个很倔强、有个性、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

作为舞剧领域的“新人导演”，陆川发现舞台是“镜框叙事”，表达手段是无限的，例如舞台对于蒙太奇的使用更自由、更极致。“一个追光、一个顶光，就能形成一个空间；一片红光区域、一片白光区域，就形成生死阴阳两界的对话”。

电影的思路亦会在舞剧里有所体现。“剧在前，舞在后”，每段舞蹈服务于人物命运，“用角色驱动整部剧”。

舞台跨界经历，给予陆川“魔力和魅力”，也为他的电影工作“充电”，“带来一次知识的更新和迭代”。

《天工开物》的市场反响，经历了从艰难起步到口碑爆发的过程。在杭州，这场舞剧的首演碰上大牌歌星演唱会，买票观众甚少，陆川甚至自掏腰包请大家看戏。

转折始于10场后，口碑发酵让《天工开物》实现逆袭：自此巡演已经连续47场售罄，观众中出现“7刷”“9刷”的忠实粉丝，有人追随巡演城市“一站站追”。陆川感慨：“舞剧票价是电影票的三四倍，甚至更多，观众真金白银支持，说明他们是‘真热爱’。”

目前，《天工开物》演了60余场。来自全国各大巡演剧场的数据显示：90后、00后观众占比高达60%，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他们，用抵达现场的双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投下火热一票。

《天工开物》最后有一句台词：此书与我们相关。“看完这部剧，你能看到一本书，以及一本书背后伟大的灵魂、一颗很强大的心脏。”

“在中国的舞剧史上，《天工开物》现阶段只是一个少年，值得高兴的是，这个少年‘活’下来了。”陆川说。

国图藏着一个“人类文明火种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方寸真微集万象 寿越千年存古今——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事业四十年”展览，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览通过文献实物、技术设备、历史档案、影像资料和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形式，揭晓了一个“人类文明火种库”的诞生过程。

自汉代以降，纸张逐渐成为人们记录与传播文明的主要载体，在带给使用者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道难题：如何让珍贵的文化遗产超越其纸质载体的寿命极限，长久地传承下去？

答案之一，是缩微技术。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副主任张阳介绍，缩微技术，是将各类纸本文献和数字资源，拍摄成缩微胶片。传统缩微拍摄流程，包括文献提取、文献整理、文献拍摄、胶片冲洗等关键环节。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诞生，源于一场与时间的赛跑。1982年，著名学者任继愈在山东曲阜孔府目睹珍贵文献因保存条件恶劣而濒临损毁，心急如焚。他上书中央，力主采用缩微技术抢救古籍。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下简称“缩微中心”）正式成立。

40年来，缩微中心联合全国25家成员馆、19家资料馆，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文献抢救保护网络，已累计拍摄古籍善本、民国文献、少数民族珍贵文献等各类文献近20万种、8425万余拍，其中包括“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多部国宝级典籍。

张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缩微技术有着诸多优势：一是缩微文献因其具有真实记录原件特征且不可篡改的特性，成为唯一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献复制品；二是能够将大量的文献资料存储于很小的空间内，“一卷缩微胶片可以容纳数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文献内容”；三是缩微文献在进行异质转化时，具有很高的复制精度和转化效率；最后，缩微胶片具有较长的保存寿命，“在符合技术标准的存藏条件下，可以保存500年至1000年以上”。

抢救古籍，是缩微中心的出发点。截至2025年6月，缩微中心共计存藏古籍善本缩微胶片5.7万余种，其中包括被誉为国图“镇馆之宝”的《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

张阳说，缩微技术还曾在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家王重民、向达等远赴英法等国，拍摄并带回1000余种被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敦煌经卷照片，入藏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记者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也曾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记者注）互换馆藏敦煌遗书胶片。200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缩微拍摄。凭借缩微技术，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世界上研究敦煌学的重要基地。

民国文献，是缩微中心正在努力的工作对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一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缩微胶片”。这是2011年，经多方努力，国家图书馆从国外购回的近5万页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缩微文献。

如今科技高度发达，数字岂不是比胶片更方便？对此，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部数字缩微组副组长马杰解释：“相较数字资源，缩微胶片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可以说是一种‘战略资源’。”

马杰出生于1989年，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数字存储已经经历了软盘、光盘、硬盘等各种载体，“数字资源需要随着介质提升不断转移，但胶片一定程度上可以‘一劳永逸’；而且数字资源的读取需要相应的数字设备，胶片其实有一个放大镜就能看到了”。

当然，面对数字化浪潮，缩微中心也与时俱进，提出了“缩微优于存，数字优于用”，推进“数字缩微”技术，实现胶片与数字资源的“双向”转换。

马杰说，一方面是“缩微胶片数字化”，将传统拍摄的缩微胶片扫描成电子影像，便于读者服务和文献开发，“中华古籍资源库通过把善本古籍缩微胶片转换为数字影像，建成全文影像数据库，免费向公众开放”；另一方面是“数转模”，将数字资源存储于缩微胶片上。截至2024年年底，缩微中心累计完成740余万拍古籍善本的“数转模”工作，其中包括《永乐大典》《十三经注疏》等重要数字古籍的处理。

在简册时代，文人读书多少以车计量，“学富五车”的成语由此而来；纸本时代，五车竹简内容只需要一个书包便可装下；缩微技术出现后，一个胶卷便可容纳其全部内容。载体在变，不变的是文明的传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缩微胶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声 明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100001523000 2458）名称变更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作废原公章、钢印、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广告·